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7.04.010

推进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支持网络建构

——以安徽省为例

周筠婷¹, 张超²

(1.安徽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合肥 230059;2.安徽行政学院,合肥 230059)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是该群体社会融合和市民化进程中的工作重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群体的生活和社会支持状况,这既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迫切任务,也是促进工业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安徽省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相关特质,发现该群体社会支持网络规模虽然不大,但是网络构成的异质性增加,先赋性关系和后生性关系都在发挥重要作用,处于多元共生阶段。为了继续推进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达到最终的社会融合,就必须通过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多方共建其社会支持网络,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支持网络;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F304.6;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7)04-0072-07

统筹城乡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是该群体社会融合和市民化进程中的工作重心。深入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和建构,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群体的生活和社会支持状况,这既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迫切任务,也是促进工业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探究社会支持网络的作用机制,不仅可以为对策的提出提供可靠有效的触发点,还能为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提供新的逻辑起点,是对中央“努力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精神的积极回应。

一、研究背景

社会支持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它是一定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体社会支持网络通常指个人能够从中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物质、情感、就业、社交等),以缓

解并处理各种日常问题,维持生活的正常有序进行的社会关系的集合。社会支持网络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网络,正式社会网络主要包括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非正式社会网络主要包括亲缘关系、业缘关系和地缘关系^[1]。

国内社会学领域对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一直和弱势群体、特殊群体紧密相关^[2-5]。张文宏等最早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行比较,并从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作了解释^[6],这是我国整体网络研究的开始^[1]。对于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多以个体网络特征为切入点,王毅杰等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具有规模小、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等低等特点^[7]。这些个体的网络特征加上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导致了他们城市生活的交往困境,直接妨碍他们与城市文明同化和交融^[8]。李树苗等从整体网

收稿日期:2017-05-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RK016)

作者简介:周筠婷(1984-),女,安徽合肥人,安徽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张超(1972-),女,四川成都人,安徽行政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学研究。

络的角度揭示了农民工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与融入城市之间的关系^[9]。个体在向社会网络成员寻求帮助并得到支持的过程是一种互动,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和关系构成来表示。所以对支持网络的分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融合的状况^[10]。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市中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影响其融入城市的意愿^[11]。农民工现有的局限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社会资本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适应和认同^[12]。

然而,目前对社会支持网络建构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的研究上^[13-15]。网络建构研究也倾向于通过个案访谈收集资料,注重质的研究^[16-17]。本文正是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旨在通过大规模调研收集到的一手数据,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和构成,力图为建构该群体社会支持网络提供政策建议,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二、研究设计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安徽行政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2016年2月在安徽省内进行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专项调研数据。此次调研的对象为“年龄在16周岁以上,户籍为安徽农业户口的在外地打工人员”。其中,女性占37.7%,男性占62.3%;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80.1%;新生代群体(1980年以后出生且年满16周岁)占总体的35.5%。此次调研的内容包括安徽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情况、城市生活工作的成本收益状况、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以及该群体的市民化意愿等。此次调查随机发放问卷1800份,在实地调查和数据录入过程中,研究人员采取了一系列质量控制措施,最终获取有效问卷1460份,并在此基础上,于2016年下半年对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对象以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追踪调查。获得的数据质量可靠,能基本反映安徽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情况和社会支持网络现状。

本研究在范德普尔社会支持分类的观点基础上,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划分为物质、就业、情感和社交四个维度。其中,物质支持主要涉及借钱和日常事务的帮助;就业支持涉及就业信息的获取;情感支持包括情绪疏导、排解,精神安慰和重大问题的咨询等;社交支持涉及工作之余的社交活动,如外出、就餐、逛街等。

(一)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及分布状况

网络规模主要是指构成一个个体社会支持网络的成员的数量。本研究参照范德普尔的提名法,采用以下问题作为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成员名单的获得:

物质支持:当你在城市手头紧,缺钱的时候,你会向谁借钱?

就业支持:如果你在城市要换一份工作,您可以从哪里获得信息?

情感支持:当你在城市工作心情烦闷的时候,你会找谁倾诉?

社交支持:周末或工作之余,你会选择和谁一起打发时间?

调查员先向调查对象提出这些问题,然后再询问这些人与调查对象的具体关系,即网络构成。

如表1所示,统计数据显示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平均规模都在5人左右,社会支持网络较小。四个维度中超过半数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都在5人及5人以下。其中,物质支持网络的标准差为44.161,这充分说明该群体的物质支持网络规模差距很大,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支持网络规模最大的为就业支持网络,平均规模超过9人。另外,超过20%的受访对象的就业支持网络规模超过10人。根据访谈过程中的信息可以得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就业渠道增加,除了亲戚朋友和老乡的介绍和帮带,网络也成为他们就业信息的重要来源。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比他们的父辈更懂得依靠互联网增加信息和人脉资源。农业转移人口的情感支持网络的规模不大,平均规模在5人左右。社交支持网络在本次调查中的规模最小,均值为4.39,规模差距很小,这说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交往支持普遍薄弱。

表1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规模

维度类型	平均规模	网络规模分布情况(%)		
		≤5人	6~9人	≥10人
物质	5.47	62.68	24.65	11.92
就业	9.33	51.86	25.14	21.58
情感	5.62	77.05	14.52	8.42
社交	4.39	63.28	28.15	8.56

(二)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关系构成

社会支持网络的关系构成体现了网络的质量特质,主要是指调查对象和其网络成员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本研究中主要设定的关系有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或恋人、其他亲戚、同学、朋友、同乡、同事、老板、邻居、网友、社区工作人员、宗教或社会组织的人员。格兰诺维特发现美国人在求职过程中主要依靠弱关系找到工作,进而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假说,边燕杰则发现,在计划体制下中国人主要是依靠强关系来寻找工作^[18]。国内研究主要将亲缘和地缘关系作为强关系,将友缘和业缘等关系作为弱关系^[19]。强关系代表的是农民工群体内部同一流出地的、高度同质的社会关系;弱关系代表的是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及农民工群体内部不同流出地的、相对异质的社会关系^[10]。王毅杰等对边燕杰及汪和建的观点进行了综合,将前五种关系称为“亲属关系”,并归类为强关系;最后三种关系称为“相识关系”,归类为弱关系;其余称为朋友关系,归类为中间关系^[7]。

1. 农业转移人口物质支持网络构成

在农业转移人口的物质支持网络构成中(如图1),选择频次最高的选项依次为:兄弟姐妹、朋友、其他亲戚和父母。由此可见,亲缘关系仍占据关系构成中的主要地位,而朋友关系也是其关系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农业转移人口的物质支持与家庭联系相当密切,尤其是兄弟姐妹所起的作用远远高于其他几个社会支持网络。虽然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该群体的生活场域发生了转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血缘、地缘关系这些原有的先赋性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边界。血缘关系仍是农业转移人口所依赖的重要社会关系。在随后的访谈中,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示,在工作初期“自己的圈子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所以向父母或兄弟姐妹“伸手要钱是无法避免的,不然活不下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城镇生活工作时间的增加,他们更倾向于向朋友借钱而不是亲属。第一,农业转移人口的朋友群体同质性较高,他们相似的生活水平和城市境遇使其更能够理解对方的困难处境——“谁能没有手头紧的时候呢?”第二,很多受访者尤其是男性受访者都承认“不想让家里人看不起”、“出来混得有点名堂”,这种传统观念的压力使得他们不愿意向亲属张口寻求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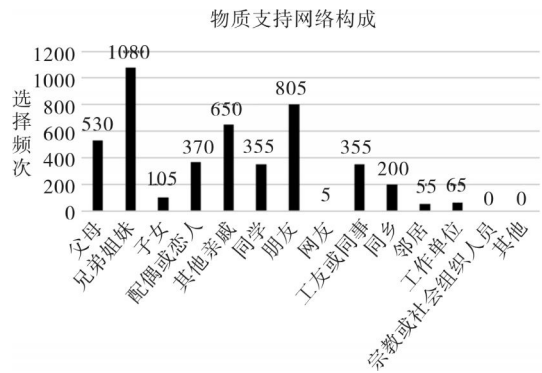


图1 农业转移人口物质支持网络构成

2. 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支持网络构成

从图2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非亲缘关系超过亲缘关系开始在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支持网络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社会关系的构成依次为朋友、其他亲戚、兄弟姐妹、同学和同事。朋友关系即中间关系力量开始突出,成为就业支持网络的主要构成,亲缘关系成为重要补充。农业转移人口在进城初期的确要依靠以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为主要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城市安顿下来,解决诸如住宿和工作的问題。这种先赋性的关系资源可信度高,成本低,可以迅速帮助他们稳定就业状况,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顺利停留的重要依托。但是先赋性社会支持网络的同质性高,且具有内卷化趋势,所以农业转移人口要想更好的融入城市,必须动用更多的后生资源,后生资源的丰富程度标志着网络资源的成熟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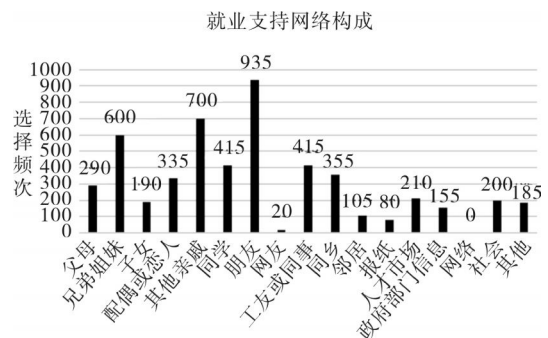


图2 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支持网络构成

3. 农业转移人口情感支持网络构成

在农业转移人口的情感支持网的关系构成中(如图3),朋友关系和配偶与恋人关系占据了主要位置,其次是兄弟姐妹和同学。这说明在情感支持方面,调查对象更倾向于依赖自己同辈的社会关系。从总体上看,亲缘关系在情感支持网络中所占

比重最大,包括配偶、兄弟姐妹和父母,而配偶在所有亲缘关系中占据最重要地位。而在以往研究中,只作为情感支持网络中亲缘关系补充的朋友关系^[117]在本研究中作用上升,甚至超过了配偶,成为选择频次最多的社会关系。在后续的采访过程中,很多受访者表示“父母思想太保守”、“家里人总喜欢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干涉你”、“好多想法父母亲理解不了”、“不想把自己的压力带给身边最亲近的人”是他们不愿意向父母等亲属进行情感倾诉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寻求关系地位相对等的的朋友来获取情感支持。配偶与恋人关系属于新生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和朋友关系一起开始逐渐代替传统的血缘和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先赋性社会支持网络,影响力开始逐渐加大。然而数据显示,城市居民、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城市关系资源即典型的弱关系在农业转移人口的情感支持网络中所占份额微乎其微。城乡二元制度割裂的直观体现之一就是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态度多为漠视甚至歧视,再加上场域的限制和割裂,很多受访者均表示“城里人感觉和我们还是不一样,有距离感”、“城里办事的地方的人态度都不怎么好”、“住的地方基本都是工友,当地人比较少”,因此不愿意向城市居民或组织寻求情感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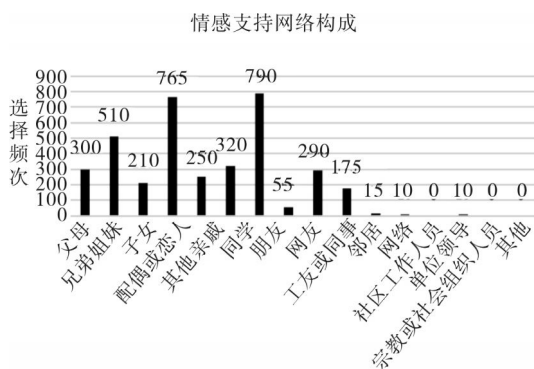


图3 农业转移人口情感支持网络构成

4. 农业转移人口社交支持网络构成

如图4和表2所示,调查数据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交往的圈子主要是同事、同乡、亲戚和家人,同事关系即业缘关系的选择频次最高。由此可见,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以后,社交支持来源已经开始由亲缘和地缘等强关系向业缘关系这样的弱关系扩展。从访谈数据中能看出不同行业和年龄段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同事群体的构成也有所不

同。总的来说,从事技术性含量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同事群体构成的异质性高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农业转移人口和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这里主要指其同事群体中的城市市民和同为农业转移人口但流出地不同的成员比重。虽然业缘关系已成为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社交来源,但亲缘和地缘关系仍是他们社交支持网络的重要构成,而该群体的社区交往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活动交往少之又少。在后续采访过程中,很多采访对象表示“社交浪费时间、精力和财力”,“不知道谁愿意跟我们交往”,可见过高的社交成本和社交平台的缺失也是造成农业转移人口缺乏社交支持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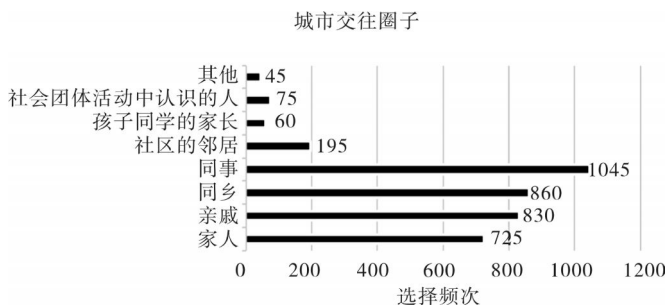


图4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交往圈子构成

表2 农业转移人口社交支持网络构成数据表

城市交往圈子	选择频次	占有效问卷数的百分比(%)
家人	725	49.66
亲戚	830	56.85
同乡	860	58.90
同事	1045	71.58
社区的邻居	195	13.36
孩子同学的家长	60	4.11
社会团体活动中认识的人	75	5.14
其他	45	3.08

三、研究结果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和构成能够反映其城市融合的现实状况,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既包含了其群体内部的融合,也包含了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市民的融合,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农业转移人口的总体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偏小。其中,社交支持网络规模最小,说明该群体

的城市交往范围很小,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从关系构成方面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除就业支持网络以外,仍以亲属关系为主,具有同质化特征。但是朋友关系这样的中间性力量稍弱于亲属关系,其力量开始突出。由此可见,该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正逐步从以亲缘和血缘为核心的先赋性社会关系向友缘和业缘等后生性社会关系推进,两者处于多元共生阶段。然而,典型的弱关系(来自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的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城市关系)在该群体的网络构成中微乎其微。由图5的数据可见,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使用较多的是公共设施,而对政府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享受的很少。在前文分析的几大社会支持网络构成中,来自社区的关系构成所占比重也是微不足道。上述分析说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纽带。这样的社会关系网虽然有助于减轻农民工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却难以靠它获取城市资源。因此,必须以他们信任的强关系为基础,进一步建构和发展新的社会网络,从而逐步融入社会^{[1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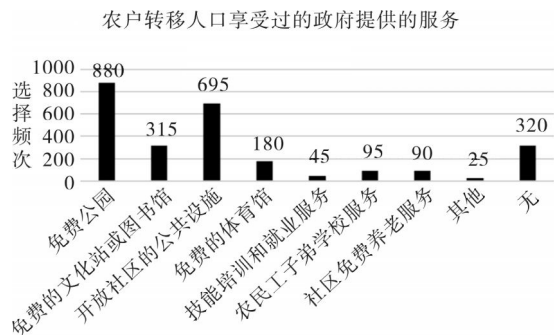


图5 农业转移人口享受过的政府提供的服务

四、政策建议

(一) 政府层面

消除制度障碍,加强政策支持。将一切与户籍制度挂钩的社会保障制度松绑,让所有公民都不因其出生的身份不同而区别享受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的社会保障服务。只有在平等的环境下个人才有可能真正消除内心的自卑,没有负担地利用各种可用的社会支持^[17]。

正面宣传,正确引导。城市居民的“低眉”和农业转移人口的“仰望”是剥夺农业转移人口城市生活认同感并产生“过客”心理,从而阻碍其市民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要起到积极的宣传和引

导作用,对城市社区居民宣传农业转移人口对当地经济繁荣和发展的贡献,提高本地居民的社会包容性。改变政策中区别对待市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歧视性色彩,消除社会成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歧视性认同,转变将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外来人员的排斥性观念,将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统一称作“产业工人”,确立其城市生产者的主体地位;将其他农业转移人口称作“城市新居民”,确立其城市生活者的主体地位。只有农业转移人口有了平等的切身感受,才会乐意与城市居民互动,进而改变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结构,构建更为多样的、信息资源更为丰富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其市民化进程,最终实现社会融合。

引导和规范农业转移人口各种组织的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中的自组织是他们重要的社会资本来源,能帮助他们实现自身利益的表达和权益的维护,提高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在进入城市初期有利于他们熟悉陌生的城市环境,获得就业和情感上的支持。但是过分依赖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往往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形成新的社会资本,使得他们难以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因此,政府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自组织如同乡会进行规范和引导,通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社区与居民的联系,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增加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打破陷于底层社会的枷锁和狭隘的先赋性乡土社会网络。

(二) 社区层面

社会生活的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21]。社区从地域上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使之形成共同的文化和利益倾向,也是感情支持的最大载体之一。社区融合是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的起点和关键,是城乡二元制度逐渐淡化和转化的载体^[22]。因此,对于社区而言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其管理体系当中,转变传统二元结构下的管理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切实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生活中的困难。对特殊对象提供个性化服务,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在社区形成互助合作的良好社会风气与助人氛围,促进社区融合。其次,以社区为桥梁,搭建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平等交流的平台,鼓励农业转移人口主动加强与异质群体即弱关系的交往,摆脱以往以强关系为主的同质型社会关系网络的

桎梏。社交支持网络中异质性强的关系才能提供重复性低的、具有稀缺性的有价值信息,从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资本的积累。第三,在社区设立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援助机构,定期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及时疏导农业转移人口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的心理障碍,提供情感支持,成为他们以亲缘为主要构成的情感支持网络的重要补充。

(三)社会组织层面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组织的参与度是其城市融合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首先,在统筹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背景下,各类社会组织要迅速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切实增强吸纳能力,对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一视同仁,积极接纳该群体进入社会组织,扩大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其次,多层次多渠道建立旨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以及他们的子女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项目和平台。例如,建立各种趣缘组织、组织微公益类活动等,鼓励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子女的社会参与度,改善他们在城市的融入水平,并通过代际传递最终达到社会融合。最后,各类社会组织要积极开展针对农民工的各种培训活动,如就业指导、职业培训、文化素质培训等,帮助农业转移人口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水平,增加人力资本,加快市民化进程的速度。

参考文献:

- [1] 周林波. 统筹城乡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D]. 重庆:西南大学,2010.
- [2] 张长伟,沈斌. 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J]. 继续教育研究,2012,(2):19-20.
- [3] 崔丽娟,李虹. 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J]. 心理科学,1997,(2):123-126.
- [4] 刘巍. 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来自甘肃省的调查发现[J]. 妇女研究论丛,2012,(5):28-35.
- [5] 陆一琼. 艾滋孤儿社会支持网络及其差异性研究——基于湖北省均川、卧龙两镇实地调查的探讨[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 [6] 张文宏,阮丹青.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 社会学研究,1999,(3):12-23.
- [7] 王毅杰,童星.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J]. 社会学研究,2004,(2):42-48.
- [8] 王毅杰,王微. 国内流动农民研究述评[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6.
- [9] 李树茁,任义科,费尔德曼,杨绪松. 中国农民工的整体社会网络特征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06,(3):19-29.
- [10] 李树茁,杨绪松,悦中山,靳小怡.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08,(2):1-8.
- [11] 朱考金,刘瑞清.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城市融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 青年研究,2007,(8):9-13.
- [12] 刘传江,周玲.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 人口研究,2004,(5):12-18.
- [13] 颜宪源,东波. 论农村老年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J]. 学术交流,2010,(6):153-156.
- [14] 田萍. 社会生态维度下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系统建构[J]. 求索,2013,(10):238-240.
- [15] 邱观建,安治民. 我国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络的运作逻辑与建构[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615-620.
- [16] 蒋静. 社会支持链接:一个打工妹和城市社会的互动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2003,(2):17-24.
- [17] 张超,董楠.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J]. 特区实践与理论,2013,(5):81-84.
- [18] Bian Y.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62):266-285.
- [19] 边燕杰,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
- [20] 曹子玮. 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J]. 社会学研究,2003,(3):99-110.
- [21] 李培林. 社会生活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J]. 江苏社会科学,2001,(1):53-55.
- [22] 黄锬.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区管理机制[N]. 中国经济时报,2015-05-28.

(责任编辑:卢君)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s ——Taking Anhui as an Example

ZHOU Yun-ting¹, ZHANG Chao²

(1. Anhui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Hefei 230059, China; 2. Anhu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Hefei 230059, China)

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rural migrants is the core of work i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tizenization of the population, which can in some extent reflect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support. This is not only the urgent task of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z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Anhui rural migrants, it is discovered that although the scale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population is not large,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increases. Ascribed and epigenetic relations are both playing a crucial role, thus the construction stage is symbiotic. To promo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rough multi-party cooperation, namely, the government, the commun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us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will be sustained.

Key words: rural migrants; citizenization; social support network; social integration

(上接第71页)

Comparison of Determinant Factors of the Elderl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for Medical-Nursing Care Will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YANG Qun^{1a}, LI Xuan-yu^{1b}, DAI Wei-dong²

(1.a.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and Law Institute; b.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Anhui 24700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he system analysis tools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data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16 factors are combined weights calculation and sorting. Study found that: physical condition and household income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s the choice of medical-nursing care mode, has also significantl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reason of many urban elderly have pocketbook, the selection autonomy of medical-nursing care mode is strong; The individual income, living way and children care, by urban elderly people become the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e intentions than rural elderly; since the deep family endowment ideas of rural elderly, social evaluation, family awarene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fluences than urban elderly.

Key words: medical-nursing care; endowment pattern; urban and rural comparison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